

深入研究**基础教育**当代问题

当前位置: 首页 &gt;&gt; 学术前沿

## 郑金洲:教育学的时代使命

发布者: admin 发布时间: 2008年3月31日 已被浏览 99 次

[摘要]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处于这一重要历史发展时期的教育学需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要融入经济社会,彰显教育智慧;聚焦教育改革,构筑教育自身的创新体系;推进理论原创,引领教育理念变革方向;关注教育实践,影响教育决策。

[关键词]教育学;时代特征;使命

[作者简介]郑金洲,教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领导教育学。

学术是时代的声音。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对学术的特定要求;每一个时代的学术,都应反映所处时代的特征。中国教育学,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应该承担怎样的时代使命,完成时代赋予的哪些职责,是关乎教育学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是每个教育学家都需要思考的重大课题。

## 一、融入经济社会,彰显教育智慧

虽然教育学教科书,在谈到教育规律时,时常有这样的论述: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是教育的基本规律之一,但是在近年来,不可否认的是,面对迅速变化的经济社会需要,教育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落伍了,并没有达到“适应”的要求,甚至有游离于经济社会的征兆。如果检视一下近年来的教育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教育学研究在经济社会发展某些重大变化上存在“失音”或者说“缺位”现象。教育是经济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学研究理应密切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出本学科的声音,贡献本学科的智慧,让教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让教育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学术支撑。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许多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是难寻教育学的踪影的。比如说,城市化是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教育学家极少对此予以关注,一方面在城市化战略选择中极少有人论及教育,对教育影响加以考证分析,另一方面当城市化来临时,也极少有教育学者去探讨城市化对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去考量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城市化倾向等一系列问题<sup>1</sup>。教育学者的“失音”与“缺位”,给了众多其他学科的学者或拥有一定行政资源的人员更多的发言空间,他们可以肆意对教育问题作出评判,提出意见,进行针砭,使教育在经验中或在其他学科的“阴影”中踟蹰前行。而一旦这些人的判断在教育实践运行中出了问题,又常常是教育学者代人受过,成为被批评和指责的对象。

第二,教育学研究被动适应经济社会变化的现象较为严重,缺乏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勇气和智慧。平心而论,教育学对经济社会变化并非熟视无睹,有的学者甚至敏于这些变化,对经济社会变化作出相当迅即的反应,但总体上,这种反应是被动的,是处于“守势”的。常常是经济社会变化在先,教育学界的论说在后。相反的情形近些年来似乎还没有出现过。教育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完全依赖于教育的反应与智慧,这一道理是众人皆知的。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教育毕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and 领域,来自于教育学界的智慧理应被尊重,来自于教育学界的理论探讨理应被纳入经济社会变革思考的范畴,而教育学界恰恰缺少的是被经济社会发展看重的智慧,无作为也就逐渐变得无地位,如果长此以往,教育学界即使有真知灼见的话,也完全有可能被有意无意忽略。

第三,教育学研究未能及时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给教育带来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对于今天经济社会的变化,曾有人这样来形容:“只有变化才是不变的,只有不确定才是确定的”,这样的概括或许有些过头,但比较形象地刻画了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变化状态。当变化成为一个常数或恒量的时候,学术研究的重大职责之一就是把握变化发展的趋向,分析变化引发的各种问题,甄别变化带来的各种矛盾,对教育学研究来说,尤为如此。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对教育意

味着什么，利益群体的多元化给教育带来怎样的冲击，分配方式的变革引发了哪些教育问题，价值规范的歧异化对教育有着怎样的深刻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教育学回答，但事实上我们极少看到这方面的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第四，教育学研究未能及时倾听民众的呼声，密切关注舆论舆情，为教育困境找出解决问题的方略。对于这样的批评，也许许多教育学者不以为然，觉得关注民生与舆论是政府官员的事情，是行政管理人员“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体现，与教育学研究者无干。其实，教育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其重要的职责就在于从民众关心的教育问题中确定研究对象，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方略与方法；就在于从舆论舆情中寻找教育热点，对这些热点提出学界的思考与评判。从今天来看，无论是百姓呼声，还是舆论评点，都只看到教育行政部门“消防队式”的回应，很难看到教育学界的独立、客观、学理性的分析。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民众民主意识空前高涨的时代，教育学界也要考虑转变原有的学术思维定势，转变传统的高居学术殿堂的清高形象，也要急民之所急，回应民情，答对舆情，把民众和舆论关注的问题作为研究的着力点。

教育学研究要改变上述境况，实现历史担当，就需要强化大局意识，真正做到放开视野看教育，把教育活动和问题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探寻教育困境的出路，从国家发展的大格局中确定教育发展的定位；就需要强化责任意识，把教育学者的职责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联系起来，与民众对教育的呼声联系起来，与教育上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联系起来，切实贡献教育学研究者的智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来自于教育学者的智力支持；就需要强化服务意识，把为实践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教育学研究的出发点，将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与经济社会实践需要、教育的实际需求、人民群众的教育渴望紧急结合起来，在服务中体现自身的价值，体现自身的学术力量。

## 二、聚焦教育改革，构筑创新体系

2005年，围绕着经济改革，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力主改革者有之，提议“推倒重来”者有之，骑墙者有之，但无论哪种观点，都体现了经济学人对改革的强烈关注，反映了对改革的不同看法。同样是在2005年，围绕着医疗体制改革和住房改革，社会科学界也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探讨，为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问诊把脉，做出了一些不同的判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认识。但反观教育学界，对教育改革似乎并未作深层次的分析与评判，研究者的热情更多地是在教育教学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缺乏学者应有的对教育改革的“宏大”关注。

教育学界游离于教育改革的这种现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其实已经有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就拿素质教育来说，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基础教育确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之后，学界对素质教育的深入探讨就不多，虽然成果汗牛充栋，数以千万计，但有质量的论著少，一线教育学家的论著少，解答实践疑难的论著少。素质教育推进至今，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它之所以象有些人士讲的“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既有体制机制上的原因，恐怕也有学界研究不够、学术支撑不足的原因。教育改革涉及千家万户，与社会各领域、各部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复杂性、艰巨性远超出我们的预料，这样一种改革，需要学界参与，需要学界将教育实践的经验加以提炼，对国外有益的做法加以批判吸收，对教育改革各相关利益群体做出分析。而作为教育学界来说，参与这样一场给教育带来重大变化的改革，是一种历史机遇，是彰显其学术价值的重要平台，是提升其学术品质的“可遇不可求”的关键契机。既然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教育学界的同仁就应当直面教育改革的困难和问题，为教育改革提供智力支持，为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贡献学理智慧，为提高教育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做出教育学界自身应有的贡献。

把研究的焦点转移到教育改革上来，就需要加强对教育改革问题的研究，从世界范围内把握教育改革的基本特点和总体发展趋势，历史地看待教育改革的发展，敏锐地捕捉改革带来的新变化，着力探讨改革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就当下来说，就是要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注重对教育创新的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要加强构建教育创新体系的研究。

无论是教育创新，还是创新教育，对教育学界来说，都不是陌生的词语。它们从上世纪末就已经进入到教育学界的视野之中。将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教育创新好像没什么“创新力度”，创新教育也好像没出现什么教育新形态。人们猛然发现，撇开各种各样的创新的标牌，真正带来的新东西不多，产生的新气象不多，鼓舞人心的新成果不多。在反思这种现象的时候，不难看出，我们在大张旗鼓地推进创新的时候，对教育创新的前提性问题缺乏深刻分析，对教育与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必要的研究，对创新的各种障碍缺乏探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缺乏辨析，凡此种种，都与教育学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关联。学术研究的重要职责就是究根溯源、穷理极辨，因为正是在这种不依不饶的不懈探索中，“理”才逐渐变得明晰起来，“达理”之路才越发变得清晰可见，实践活动才会在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中变得知性而明确。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的逐渐建立，教育创新体系的建设已提到议事日程，教育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教育创新体系的框架结构、教育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内在联系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教育理论界做出学理分析。理论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源头，理论研究是提升实践活动科学性的前提保证。教育学界在教育创新体系的构建中，可以发挥自身优势搭建起教育知识创新体系的大厦，形成教育技能创新体系的新平台，勾勒教育制度创新体系的轮廓，并通过研究大力推进区域教育创新体系的建设，催生教育中介服务体系，从而推进教育创新总体体系的建设。

## 三、推进理论原创，引领理念变革

教育学的原创或者说教育理论的原创，是近几年大家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教育学界清醒地认识到，现有的研究缺乏原创问题、原创素材、原创成果，与教育学的地位不符，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不符<sup>2</sup>，需要推出大量的扎根本土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对教育学做出这样的判断，既反映出教育学者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同时也可从中透视出教育学者的矛盾心理和尴尬情态，因为这意味着一种自我否定，意味着要重拾自我超越的勇气，力争在当今的时代中使教育学呈现出新的形貌。

教育理论的原创是时代的要求。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前无古人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后无来者的。在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工业化日益逼近的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工程的今天，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独特的，原有的教育理论不能给予诠释与说明，国外相关的理论充其量也只能起到参照和借鉴的作用，除了扎根中国的教育土壤，消化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教育理论成果，建构符合这一特定时代要求的原创理论别无他途。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在教育学界中存在着“言必称希腊”的现象，一些学者的论著不仅理念是西方式的，甚至连语词也是西方式的。这些成果远离活生生的教育实际，用“空降”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教育实践。更值得关切的是，教育中的某些实践行为也有意无意全盘吸纳了这些理论，并且以这些理论为基础构筑实践的基石。教育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它和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为教育发展提供物质支撑，文化为教育发展提供精神支撑；经济可以为教育披上鲜亮的外衣，而文化则是为教育赋予灵魂和擦亮眼睛的。在我们把西方的教育理论整体移植进中国教育中来的时候，我们也就把自己的教育灵魂拱手相让给了他人，也就使自己观察问题的眼镜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体现，文化崛起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内容，教育作为文化的承载，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应直面本土实践，在历史的深远眼光和世界的宽广眼光中，形成中国原创性的教育理论成果。唯有原创，才有出路。

理论蕴含理念，理论研究也催生着一系列新理念的形成。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是产生符合时代要求新理念的基础。教育学界在推出原创性成果的同时，一方面要注意自身的研究是建立在何种理念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还应注意从成果中析离能够影响实践并且符合实践要求的理念。从现在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有待加强。教育学界提供的研究成果是丰富的，但很少有学者就这些成果中体现的新理念作提炼加工，更少有学者对理念作形式化处理，以至于这些可能会影响教育实践的理念长期淹没于林林总总的论著之中。理念的提升，主要是理论工作者的职责。实践工作者虽然也可提出形形色色新认识，倡导这样或那样的理念，但由于其工作的局限、经验的限制、视野的羁绊等，这些理念还需多方理论论证。

理念提出，教育学研究者的工作并未终止，还有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需要探索，那就是理念的实现途径和转化环节。理念不等同于行动。有了好的理念，并不等于有好的实践。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们提出的许多理念都是先进的，无论是八十年代的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端正办学指导思想，还是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反对传统教育、提倡现代教育，或是九十年代提出的摒弃应试教育、推进素质教育，抑或是现在提到的“以人为本”，这些理念折射着时代的要求，非常鼓舞人心。但仔细分析这些理念，我们会发现，很多理念长期处在一种语词状态，是作为一种口号性语言通行于教育实践的，并未真正落实。对教育学研究者而言，需要分析存在这种状况的原因，提出理念转化的支撑条件，从学理上判明理念转化过程中的障碍和解决对策，为理念转化的提供理论保障。

#### 四、关注教育现实，影响教育决策

教育学是门实践性学科。教育学问是应用性学问。教育学的这种学科定位，应该说是有一定共识的。从这种学科定位出发，教育学者理应关注教育实践，注重从实践中汲取营养，注重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践问题的探讨与解决。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教育学界对纯学理的关注远大于对实践问题的关注，能够成为教育学之“显学”的常常是推演式的理论思辨，而不是对实践疑难的评判。许多研究，问题来于资料，分析来于推理，对策来于玄思，与教育实践没什么关联。

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改革处在一个新的拐点上，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作出回答。教育学需要关注这些问题，从自己的学科立场给出相关的建议，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作出分析，从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的关照中作出判断。如果教育学界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放弃这些努力，将解决问题的权利全部让渡给教育行政部门的话，这些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就有可能因缺乏理论的支撑而流于经验，囿于感性，就有可能失之偏颇，造成不良影响。教育学除为教育发展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理性分析之外，还肩负有评判教育决策的使命，要对教育决策的影响以及产生的结果等进行甄别，对教育决策的运作机制及前提假设等进行评论，对教育决策的确当性与公平性等进行衡量，从而保证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学界对教育决策的分析与评判，应该是在保持与决策一定距离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没有了距离，也就没有了客观评判，所谓理性分析也就无从谈起。

对决策的关注，仅是关注教育现实的一个方面，大量的教育问题存在于中小学教育实践中，需要教育学贡献智慧、释疑解惑。无论是中小学管理者还是中小学教师，对当今的教育学研究大体都有一种认识，那就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有一定距离，读教育学著作不解渴，品教育论文没滋味，不能解决其久悬的疑问。对于这种现象，教育学界常进行这样的辩解：教育理论本来就要脱离实践，不可能完全与实践相一致，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理论。这种辩解虽有道理但显苍白。尤其当经济学界为国企改革提出各种各样见解，社会学界为和谐社会建设把脉问诊，政治学为公共治理结构的改善提出一系列建议的时候，教育学界的这种辩解就更失去了学科参照系。中小学教育实践不是没有问题，恰恰是问题成堆、问题成灾，这些问题仅靠中小学实践工作者的“行动研究”或“校本研究”是无法解决的，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引导，有一定的理性评判。教育学界失去了学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失去了自己发展的土壤。

教育学既要关注现实，也要关注未来。在今天这样一个未来指导现在的时代，未来的带有趋势性的东西，常常引导着教育的变化。捕捉未来发展动向，预测未来变化趋势，明确未来变革的愿景，是教育学参与教育现实的重要方面。理论研究承担这三个方面的重要职责：描述、解释、预测。先前的教育理论，我们重视了解释，对教育一些现象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学理分析；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描述，很少就教育现象作出细致入微的刻画，很少有对教育现实的“深描”；一定程度上漠视了预测，极少就教育发展前景作出有理有据的描绘，极少就教育中长期发展作出科学合理的判断。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教育在这20年会发生哪些变化，20年后的教育应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需要理论界作出深入研究。未来很远，我们需要看到的更远！

---

1李明三：《中国城市化争辩：城市做大还是城镇做大》，《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5月30日；仇保兴：《把脉“城市病”》，《解放日报》2005年8月19日；张在元：《走出“城市流行病”的思考》，《解放日报》2005年9月4日。

2 叶澜：《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教育研究》2004年第7期；程亮：《教育研究原创性缺乏：现象与原因》，《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8期。

关闭窗口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育学系  
200062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电话：021-62233197 Email:isrd@ecnu.edu.cn